

在四川大学为期两周的为精神分析的学生和临床同事所做的
关于“青少年”的讨论班，成都，2006年，12月¹

作者：奥利维·杜维尔²

翻译：姜余

受霍大同教授的邀请，我得以到成都做一个为期十个上午的关于当今世界青少年问题的授课。下午和晚上早些的时候，我的工作是一些关于在主体的临床中的心理学家的临床实践的会谈。

总之，每个早上被切分为大概一小时四十五分钟的理论课程，和一个紧接着的短暂的休息之后的一小时的与听众的讨论。我也让十五个左右的“督导”活跃了起来。

不必说，我可以引出督导的这些教学，为我的教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材料，将我带领到我的中国同事为我叙述的抵达同听的要求和精神照料相关的临床和精神治疗的点上来：青少年中的精神病的发动，在退行和精神病性代偿失调之间的区分，等等。

我在问题和主题猛然出现的时候做反应：在精神分析的临床相互约束和这样的约束有着精神分析的请求的后果的情况下的，儿童的，“代传递”的和疯狂的位置。

对于开业者和人类学家而言，青少年继续了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的源泉。通过临床，一个永恒的东西被精确为：青少年是一个被迫的主体化的时刻，被迫的与性的和时间的不可逆性的特质相遇的时刻。转变和过渡的年纪……当青少年这样询问他位于其中而获得躯体的文化的和精神的场景的时候，通过约束或者通过证明，他有时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在这一方面，今天，正是传统启蒙的符号性工具的局限性和机械化在提问。

“青少年”这个术语同“青春期”的术语一起表达出来，它指示了将意义赋予给身体实在的修改的精神操作，在推动了注定要在社会关系的当下状态中并被这种状态再认的性的宣言的维度上。因此，青少年是一个“过渡”：一个作出幼儿性欲

1 这篇文章是，奥利维·杜维尔先生在成都讨论班结束后不久，在巴黎，为这次讨论班写的一篇总结性文章。这里是译稿，本刊将原文附在最后，作为对本期杂志的法文摘要总结。
——编者按

2 精神分析家、人类学家、《临床心理学》期刊主任、巴黎十大教授，联系电邮：douvilleolivier@noos.fr。
<http://www.lacanchine.com>

永远地成为遭到一个重大的禁止所打击而作为巨大的放弃的客体。身体重新成为可能，但不是所有都可能。

青少年的概念逐渐地从一个临近的概念即年轻人的概念中脱离出来。但是远不是覆盖于临床、精神治疗或精神分析，而是在知道的话语和政治话语的相互关系的形成的同时结晶。以致于所谓的“青少年危机”同样也对一个人人类学的阅读感兴趣。结婚年龄的后退造成了在儿童和不断增长的成年人之间的中间阶段，这个现象带动着一个别的维度的发展，从男孩到男性以及女孩到女性的关系。

青少年具有政治的和社会的效应。精神机制中的阉割和其性提高的确认可以在某些在躯体和其客体之间的完备的整合性获取一种形式的行为中被避免（比如，毒瘾、厌食、甚至流性浪），更是一个需要再发动的欲望的，不间断得不完整性的支持，和证明进行填充的空的位置。青少年的如何体现他的能力相对于并非疯狂的欲望的联系和再发动的价值？问题是临床的，它前涉到治疗的方向。同时它也是一个在被隐喻化和符号化的设置所确认的青少年与文化相遇的维度的空间；一些尊重了话语的第三方维度的中介的空间。它回到开业者中间，建立一个常常在症状中暴露出来的，或者带到一个被某些年轻人的行为过渡不能掌握的相异性领域的，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无意识的主体没有年纪，那么一个主体化则需要断裂，需要过渡，需要时间的。青少年的过渡时期，躯体自身变得陌生，它成为了一个标志的地点，过渡的证明的地点。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强迫性的相异性，当这个年轻人将其作为他的对话者、特权的他者和总是有点过度的威胁，甚至是迫害者的时候。

于是，所有一切发生：好象，当一方面，在一个生命的单一性和一个社会的通俗小说之间的，另一方面，在每个主体的位置和其家谱的继承上之间的距离增大了，主体的绝路的危险性就扩大。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从一代到另一代的精神生活的传递的过程中的淤积。同样，被迫和“两者之一”相遇的具体形象——也是脆弱的分配——，所谓青少年的危机警告着，在现代性中对于一些再连接的，不稳定的代的裂块是在增加，好象在两代之间一个关键的挑战（话语和死亡）变得坚硬。与社会问题和挑战相关联的现代性嵌入到意味着同根源和以往的传递的过程中。

现代性和代正好作为观察和实践的领域的操作出现。精神分析和人类学的目的发生了偏移。问题是，从社会临床性的本质上来看，因为它面对着掌握在哪个东西上面，一

个可能的对青少年的精神治疗对于主体来说也是一个他试
 验的时刻——并非没有逻辑——其方式是将家谱评判的苛
 求摆在症状上。正是在我们的临床进程假设人类学集中于
 青少年危机的观点没有减缩为零的维度上，我们才可以期
 望贡献于一个同现代性的人类学的对话。

开始讨论青少年提给精神分析的问题按照安排我在成都教
 学的三个轴进行制作：

— 历史的轴：青少年概念的出现。随着对启蒙疏导的被
 看作调节从儿童到成人的过渡的持续和模型的传统模式的
 疏远，与生命的这个年纪相关问题被提到了前面。我们的考
 虑在哪个点上，年轻人可以作为暴力或作为作品产生的问
 题同大型机构性的职业而相联系着：教育、照料还有惩罚。
 在那里跟随了关于直到行为和责任的司法概念的考
 虑。

— 人类学的轴：如果青少年正是主体不再仅仅通过家
 庭的能指而且还通过社会的能指表达出来的时刻，那么青
 少年就不再作为人们必须为他做一切的儿童，而是作为一
 个欠了先于他的那代和后于他而要他负责那代人的债务的
 生命的渡者。因此他在一个运动着的世界中打开了根源的
 问题，祖先性的和命运的，在运动了的世界那里，这样的
 实质的传统的表象同样是变化着的。

— 最后是精神分析的轴：在我的教学中有着最深的探
 索和最多解释的轴。我们可以带着小心来细节化这些过
 渡：从儿童期到潜伏期，从潜伏期到青春期。正是跟随着
 弗洛伊德和谈论家庭小说中的儿童性欲理论的段落，然后
 是在拉康的帮助下，抵达到神经症的个人神话。仍然强调
 了在幼儿恐惧症同其客体和青少年恐惧症同其躯体和空
 间的关系上的区分。进一步重提了，作为考虑这个过渡的
 而使用的镜子客体的。但立刻要注意的是，它并不涉及一个
 为镜面形象的可反射平面的镜子，而是一个不可返回为躯
 体和声音的话语的镜子。在那里，显然，米歇尔·吉布尔的
 教学的留下了一个双重的痕迹。我们可以来到一个更加普
 遍化的所谓的“青少年的危机”的模式中，而得以强调在青
 少年那里的精神分析的现实性。如果青少年是每个人在其
 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时间，它也是而且尤其是性化的位置的
 时间。一个这样的选择被冲动客体的无意识标记所控制，
 根据幻想的和冲动生命的修改而被考虑。如果主体不能嵌

入到认同之中，它只能这样做：通过能指的传递者们被再认，为了这些能指代表它的能指是负重的。这个在青少年中强调的东西，是对主体来说超越了符号性的情节，是交谈的符号性结构，它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偶像的或者理想的传递，包括了在其中的功能。

关于弗洛伊德“个案”的教学（汉斯，杜拉，“年轻的同性恋”）及其拉康对它们的评论（第四个讨论班），我自己的临床，以及对“督导”带来的材料的谨慎参考滋养了我们的交流。

超越了对解释的必要的要求，同听众的交流允许了深化在精神分析历史中的在临床的病理学中的和在认识论中的研究的维度。在精神分析和神话学，连同精神分析和哲学之间的必要的对话已经处于它们的表述和区分的关键位置上。

讲授和争论的整体都记录下来。我非常感谢这些督导中间的翻译者，而尤其想感谢在我讲课过程中的唯一的翻译者——霍大同，还有提出详细和感性的重要问题的，显示出忠实、专注和慷慨的听众们。在中国，在成都和我的所有同行一起渡过的这段时光为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